

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教材



与20世纪中国

朱育和 蔡乐苏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

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概论”
课程教材

主编 朱育和 蔡乐苏
副主编 欧阳军喜 王宪明
编委 张 勇
舒 文 王 奇
鲍振芬 冯永亮
顾问 刘桂生 张步洲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教材,侧重于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来表现立体、动态的毛泽东思想。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理想”,细致探讨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章“曲折”,生动再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曲折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第三章“成功”,重点阐述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的理论形态;第四章“新探”,概括讨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

全书视野开阔,思路新颖,文笔流畅,旁征博引,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仅广泛地吸收了现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注重引介新版的史料。本书不仅适合在校大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也可为一般读者深入认识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参考。

书 名: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

作 者:朱育和 蔡乐苏 主编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1/16 印张:17.25 字数:404 千字

版 次: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ISBN 7-302-03809-0/K · 16

印 数:6501~9500

定 价:19.50 元

前　　言

我们中国人艰难而又辉煌地送走了 20 世纪,满怀信心地迎来了 21 世纪。在新世纪中,还要不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当然要学。这是因为新世纪的中国大学生肩负着继续改造、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重任,他们必然地要从 20 世纪的中国出发,展开他们新的征程。而 20 世纪的中国与毛泽东分不开,了解和懂得了毛泽东,就能在主要的方面,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昨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反过来,也只有认清 20 世纪的中国的艰辛历程,才能懂得和把握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才能顺理成章地传承邓小平的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是他们不可或缺的、必须具备的精神武装和思想武器。

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还因为毛泽东是 20 世纪中国的一个伟大群体的最杰出的代表。这个群体站在历史的正面、时代的前列,不断地探索、开拓,不懈地奋斗、工作,在历经曲折之后,为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确定了正确的理想、目标、道路、方略和方法,并且以前无古人的气魄、胆识和毅力,把濒于危亡的国家、民族挽救过来,引上了富强之路。毛泽东在这个群体中,比之其他人,看得更深、更远,更善于集中、综合和总结前人与同辈的经验与教训,形成理论、策略和方法,并卓有成效地付之实践。中国在 20 世纪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他的影响与作用最为深远。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学习这个伟大群体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造和形成的精神财富,也是学习在他们之前探求救亡振兴之道的几代人的智慧和精神。我们绝不能丢弃这样的精神财富,为此,我们就必须学习毛泽东思想,而且必须学好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和他所代表的群体在中国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总结,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包含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怎样在有限的课时中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们认为紧密结合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的具体进程,去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切实可行的、行之有效的途径。这是因为:第一,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不是在书斋中形成的,不是靠玄思冥想形成的,是在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在解决实际斗争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与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与 20 世纪的中国,是双向互动的。20 世纪的中国培育、造就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极大地反作用”于 20 世纪的中国。因此决不能离开 20 世纪的中国来谈毛泽东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二,课时有限,只能抓住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来学。毛泽东思想虽然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但其主体的、根本的内容是关于中国解放和振兴的目标、道路、步骤和方略,也

就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掌握了这些，也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精髓。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将这门课程定名为“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我们力求按 20 世纪中国的实际历史进程，如实地凸现毛泽东所进行的实际斗争和理论活动，展现他的贡献和作用。我们坚信，只有在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巨流中动态地认识毛泽东，才能正确、全面地懂得和把握他的思想和理论的要义。

20 世纪中国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两个，一是民族独立，二是国家富强，即通常所说的“救亡”与“振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定中国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独立和富强，从而确立了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理想。理想的确立与理想的逐步实现，就是我们理解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主线。毛泽东曾把在中国实现这一理想称作是写一篇大文章。这篇文章分为上、下篇，上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以大手笔写这篇大文章。在文章的“上篇”，他在实际斗争中创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系统理论，并出色地使之一一实现，化为中国的实际，取得了震古铄今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任务与问题，也许不大可能再提到我们面前了，但毛泽东完成那些任务、解决那些问题所秉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却是我们所必须学习、研究、领会和遵循的。在文章的“下篇”，毛泽东“破了题”，以无与伦比的气魄进行了探索与开拓，为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开辟和创建了中国道路；对社会主义建设，也力求走自己的路，在许多方面和一定意义上，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了先河。当然，众所周知，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严重的失误。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样，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成功与失误，都与此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包括所处的国际环境分不开。对于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误，我们都要以中央决议的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正确的成功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当然要学习。毛泽东的失误，我们同样要进行深入地认识与研究，弄清其性质和根由，以吸取教训和智慧。

从历史的角度、围绕着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这一理想的确立与实现来阐述毛泽东思想这一主线确定后，我们在写作这本书时就力图体现这个主题思想。因此，我们打破通常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教材条块分割的编写模式，把毛泽东思想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考察、去阐述。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理想”，旨在告诉同学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理想的确立有一个过程，它不是几个知识分子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而是中国人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一个历史选择。在这个探求过程中，毛泽东在同时代人的影响下，紧跟时代的潮流，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章“曲折”，旨在说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理想与现实关系问题上所经历的迂回曲折的认识过程。当中国共产党人把理想付诸实施的时候，经历了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两次大起大落，在这两次起落中，党的领导犯了先“右”后“左”两种错误。把社会主义理想与民主革命现实脱离，认为共产党人不必去掌握现阶段革命领导权的，是“右”倾观点；反之，认为在现阶段革命中就要去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是“左”倾观点。毛泽东本人也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在斗争的实践中，他提出了一些既区别于“右”也不同于“左”的、后来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思想观点，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第

三章“成功”，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和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就赢得了两种中国命运决战的胜利，它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成功。以上三章，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章的“上篇”。第四章“新探”，中国革命成功后，面临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注意的是，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他的失误，仍然是在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时出现的偏颇，这说明，过去在处理理想与现实关系时处理得好，以后不一定能处理好，这是特别发人深省的。这一章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章的“下篇”。

教学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能否引起青年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学有收益，是理论教育成败的一个关键。要使读者有兴趣，必须使毛泽东思想的教学具有科学性、针对性、探索性和生动性。科学性，首先要求尊重原始史料，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仅仅罗列史料，还只是停留在历史的表面现象上。只有做到展开历史事件时注意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纵向和横向位置，注意它和前后左右事件的联系，叙述人物时不忘其历史背景，将他放在当时社会环境中做全面分析，这样透过现象看历史的本质，才是科学的，才能使同学们心悦诚服。针对性，就是要针对当代青年的特点和他们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有的放矢，使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学生思想逻辑三者一致。探索性，就是要注意当代人对历史的不同观点的介绍，让青年学生在比较中探索，在探索中寻得真理，受到教育。生动性，就是把抽象的理论与具体的历史结合起来，因为历史本身就是有血有肉、生动具体的，只要我们取材典型，史论结合，寓论于史，是一定能引起广大读者学习兴趣的。以上四点，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有的放矢，史论结合，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十六字方针，它是我们编写《毛泽东与 20 世纪中国》时努力遵循的原则。效果怎样，还有待教学实践的检验。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都比以前有更好的条件。因为历史的推移，中国以及世界的变动，使许多新史料、新研究成果涌现到我们面前，加之学术界新风气的逐步形成，我们有可能对 20 世纪的中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取得更全面、更深入和更准确的认识。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充分运用了新出版的一些史料，也吸取了学术界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大胆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我们期望这本书能有助于培养青年学生开拓进取的精神，提高青年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当然，由于在主观上，我们的水平有限，客观上，时间有限，可以肯定的说，这本教材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失误。这只有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改进，盼望同行、专家多多给予批评帮助。

编 者
2000 年元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理 想	1
第一节 寻求富强之路	3
“君宪救国”的尝试	4
“民主共和”的方案	6
启蒙及其困境	9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	13
第二节 时代思潮的转变	17
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思潮	18
几组观念的变迁	22
时代思潮转换对毛泽东的影响	27
第三节 理想的确立	32
思想的分裂	33
社会主义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37
再进一步	40
毛泽东的思想转变	43
第二章 曲 折	48
第一节 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失败	49
国民革命的目标	50
毛泽东分析敌、我、友	60
“矫枉必须过正”	64
国民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68
第二节 土地革命大潮起落	75
上山	76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80
遵义会议	84
三次“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及其教训	91
第三章 成 功	99
第一节 统一战线与独立自主	101

统一战线的出发点是团结人.....	102
团结范域的准确划定取决于对主要矛盾的正确把握.....	104
如何团结——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	114
第二节 武装斗争与群众路线.....	122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23
依据敌我双方的根本实际,以确定自己之角色位置与活动舞台	125
从远处大处着想,于近处实处着力	129
第三节 党的建设与实事求是.....	137
党内不团结的根源.....	139
从思想方法抓起、从高层领导抓起	144
整顿三风转变全党的思想.....	149
加强党的领导的一元化.....	154
第四节 现实与理想之间:新民主主义论	161
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国人被打入闷葫芦,不知所向	162
舍我其谁: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必须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168
分两步走:怎样领导中国特殊的民主革命?	176
第五节 两种命运的决战.....	184
为了人民的利益去谈判.....	185
铁老虎、纸老虎	193
未经过战略相持的战略进攻.....	198
有利时机、有利地点、有利条件下的战略决战.....	201
第四章 新 探.....	206
第一节 快步走向社会主义.....	207
“不要四面出击”.....	208
“组织起来”是农民“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	214
要把资产阶级“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	218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224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	229
第二节 在探索中建设社会主义.....	239
“以苏为鉴”.....	240
“大跃进”.....	243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248
还是“以苏为鉴”.....	251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253

结语	261
阅读参考文献	262
后记	264

第一章 理 想

建立一个经济平等、人人幸福的社会是有史以来人类普遍存在的理想。但在古代，消灭或至少缩小经济不平等的努力基本上都局限在经济领域。近代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开始把争取经济平等的活动与政治秩序的重建联系起来，于是就有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①

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严格说来始于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但其思想渊源却要追溯到 19 世纪的后半叶。自从 1842 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与英国通商以后，中国一步步地被纳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到 1895 年再败于日本之后，中国便完全进入了一个以西方政治和文化霸权为主导的时代。此时，西方列强已纷纷入侵中国，操纵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使中国从一个主权国家沦为一个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不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又由于逐步有了资本主义经济，但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国又从一个封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国家，即通常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当时中国的国情。面对着处于强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和价值观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思想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蜕变期，从此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斗争便围绕着迎拒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1898 年的维新、1911 年的革命及 1915 年后的新思潮运动，虽然方式不同，目的则都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文化，从而把中国引向富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都没有成功。正当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指示了另一个方向。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失望之后，一部分人终于决定以俄为师，确立了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理想。可见，从 1842 年以来的这一较长历史时段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学

^① 近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 1830 年前后，在法国指傅立叶和圣西门的思想，在英国指欧文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以及 18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大量空想主义著作。但实际上作为近代社会主义根源的，是反对英国产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关系混乱的那些著作的思想。这些著作家批判他们所认为的不公正和平等，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控制的自由竞争。他们设想将来群众会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这几乎是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理想。开始时社会主义流派很多，后来马克思综合各派学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习西方的必然产物，它是在诸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才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由一种西方模式取代了另一种西方模式。

毛泽东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思想转型的时代，这样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是他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全部依据。离开具体的时代，我们无从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基础，离开中国这个大舞台，我们也无法理解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构成。他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思潮的参与者。

第一节 寻求富强之路

大事

- △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 △ 1894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 △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维新变法开始。
- △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 △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 △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清王朝彻底覆灭。
- △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

思考

-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过了几个阶段？
- 改良与革命这两种不同的救国方案，其优劣同异何在？
- 维新、革命与启蒙对早年毛泽东有何影响？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这一年，除了直隶一带的民变及永定河发生漫口之外，中国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沉浸在“自强”的迷梦之中。然而，第二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切便开始改变了。

“君宪救国”的尝试

甲午之战给中国带来的屈辱是空前的，中国不仅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给日本^①，赔款白银2亿两，而且还允许外国资本到中国投资设厂。更为严重的是，战争还改变了列强各国在中国的力量对比，破坏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局势，加剧了列强在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被瓜分的绝境。^②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国还只是败给西方的列强，这一次可是败给了向来就没有放在眼里的东邻日本，这对国人的刺激实在太大了，就“象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③人们开始反思：中国为什么会衰败到这种地步？经历了30多年的“自强”新政之后，一部分人终于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制枪造炮的技术还不足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中国衰败的真正原因不在技术，而在制度。因此，要救中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于是便有人打出了“维新变法”的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急先锋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1895年，康有为“公车”入都，参加会试，恰好《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各省举人群情激愤。康有为当即起草了一份14 000多字的上皇帝书，并联络603位各省举人联名上奏。康有为在上书中大胆指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法度”已完全败坏，欲谋挽救，只有从根本上弃旧图新，实行变法。书中请求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从此正式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随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宣传变法维新。^④在他们的推动下，一些王公大臣

^① 辽东半岛后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归还中国，作为“酬报”，清政府向日本追加3 000万两赔款。

^② 《马关条约》一签订，帝国主义便发出了瓜分中国的叫嚣，《字林西报》的总主笔立德禄(R. W. Little)称，“中国应该被瓜分，如果它不能管理自己，那么有人能够并且愿意管理它。”见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③ 梁启超：《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见《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上海，上海书店印行。

^④ 从1895年“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政变的三年间，全国各地创立的各种学习研讨西学及宣传变法维新的学会30多个，成立以教授西学为主的新式学堂17所，致力于传播西学和变法维新的报纸9家，书局2处。

和地方大吏也开始同情和支持变法。^①终于，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发布“定国是”诏，“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②此后，新政的诏书接连发布，变法在中央和地方的各部门迅速展开。

然而，好景不长，变法很快遭到了来自慈禧太后方面的巨大压力。^③9月12日，光绪帝还颁发上谕，令各省督抚迅速刊刻眷黄所有有关新政之谕旨，切实颁行，两天后则风云突变，光绪帝“密诏”杨锐，让他与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详悉筹议，“必如何而后能进用英达，使新政及时举行，又不致少拂圣意。”^④此后，来自西太后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光绪帝只得密令康有为等迅速出走，以免不测，以图将来。9月21日，政变发生，西太后将光绪帝囚禁于瀛台，同时下令捕拿康有为、梁启超及与新政有关的维新志士。康、梁只好亡命日本，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和林旭六人则先后被捕，不久遇害。全国上下，一时腥风血雨。

无疑，康有为是此次变法的灵魂人物。他的目的是要想效法日本，依靠光绪帝自上而下地革旧图新，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按照他的设想，变法应该是全面的、彻底的，若“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其二，连类并败，必致无功”。^⑤变法的关键是革新制度，中国应该效法日本，走君主立宪的路。^⑥君主立宪所代表的君主制度与传统的君主专制显然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加入了近代化的内容。变法以君主立宪为取向，必然引起人们对普遍王权和现存政治秩序的怀疑，它表明中国传统的政治秩序开始解体，同时也正式揭开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序幕。

^① 据梁启超《戊戌维新得罪者之略历》，在他所列的28位参与维新的中心人物中，除了康、梁及遇难的六君子之外，还有觉悟了的满洲贵族、官吏、候补官吏以及举子士大夫（见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续编》，423～4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38）。没有皇帝及一些封疆大吏的支持，新政的颁布与实施是不可想象的。

^②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68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③ 应该说慈禧太后也有变法的迫切愿望，但她所希冀的变法与康、梁所追求的目标是有原则区别的。康、梁希望从官制改革入手，进而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对这种“改制”倾向，慈禧自然本能地表现出一种警惕和反对态度，她与改良派之间的分歧，并不是变与不变的斗争，而是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什么的分歧。

^④ 《杨锐传》，《清史稿》，第42册，第464卷，12745页。

^⑤ 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696页。

^⑥ 至于为什么要效法日本，康有为是这样解释的：“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见康有为：《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目》，499～500页。

然而，康有为这种“君宪”救国的方案在当时的中国实在是太激进了。普通民众非但不能体察维新志士“以敌为师”的救国苦心，反而却视之为篡位的奸臣。^① 加之此次变法的重点在改革官制，定会触动一些当权者的利益，若不注意策略，一味求变，势必引起反动。这就是康梁变法最终无法维持下去的原因。不过，维新变法的形式虽然失败了，但变法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并且日益深入人心。从此中国便沿着“变”的道路一直走下去。梁启超称戊戌维新为“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②，实不为过。

“民主共和”的方案

与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维新运动的同时，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力量逐渐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了。他们试图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这部分人就是我们通称的革命派，孙中山便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和那时所有的爱国志士一样，孙中山开始时对清政府也抱有很大的幻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孙中山满怀希望，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他“改良祖国”的四大主张，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他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③ 显然，这是一种有别于洋务思想的改良思想。但与同一时期康有为的主张相比，孙中山的主张还是要温和得多。在上书的最后，孙中山还向李鸿章表明了他对未来的打算，他说准备先去法国学习蚕桑新法，然后顺道往游欧美各邦，考其农事，再回国仿行西法兴办农业，“惟深望于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④。可见，孙中山当时极有可能想借此机会跻身到上层的改良派中去。然而，李鸿章借口军务匆忙，拒绝延见孙中山。这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⑤，从而促

^① 这一点从《申报》在政变后不久所载的《康有为大逆不道》一文中可见一斑。该文称：“康有为大逆不道，谋围颐和园，逼勒皇太后。夫皇太后为皇上之母，亦天下之母也，而康竟谋举兵围之，且逼勒之，天下无父无君，孰有甚于此者乎。中国何尝不欲行新法，试观康、梁事发之后，朝廷惟将逆党殊殛，其余农、工、商务，则仍饬加意讲求。京师大学堂仍如前创设，各省冗员之裁汰者无一人复其原官，可见皇太后皇上之心，决不以新法为非，而有所扞格，至于康逆到海外，而仍无知妄作致书上海日报馆，肆意诋侮，且伪造密谕，离间皇太后、皇上骨肉之亲，此更狂悖之尤。薄海人民皆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见徐载平、徐瑞芳编：《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16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② 梁启超：《康有为传》，见《康南海自编年谱》，2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

^③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④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页。

^⑤ 孙中山：《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52页。

使他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从天津上书返回广东后，他没有去法国，也不再关心什么蚕桑农政，而是去了檀香山。在那里他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

开始革命时，孙中山是极为孤独的。在国内，他几乎没有什么同志，在檀香山，他多方游说，奔走数月，也“仅得同志数十人”。^①但这并没有动摇孙中山的信心。他坚信，不推翻清朝，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为此，他于1895年在广州策动了第一次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然后转道美、欧各国。流亡期间，他一面继续宣传革命，一面考察欧美政治，考察的结果使他越发深信欧美政治制度的优良，更加坚定了他推翻清政府的信心。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②。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事件是对中国人的自尊心的又一次严重打击。人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在随后的几年间，尽管清廷不断颁行“新政”，国家的情况还是一年比一年坏。一种强烈的反满情绪在东京和上海的新式知识分子中弥漫开来。这种反满的情绪又迅速转化为一种革命的要求。1903年，东京和上海都涌现出一批宣传革命的刊物和一批杰出的革命宣传家。1904年，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兴中会等革命团体相继成立，革命成了时代的最强音，时论指出：“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③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投身革命的志士越来越多，孙中山也逐渐成为人们公认的革命领袖。^④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转赴日本。在那里，他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②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35～36、86页。

^③ 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一，下册，65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④ 孙中山的形象在留学生及新式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认为他不过是在广州湾一海贼，到1903年后，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一变而为“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这一变化，正好反映出留学生及新式知识分子由爱国而反满而革命的心路历程。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一）》，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为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实行种族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创立民国”就是实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平均地权”就是实行社会革命，以解决社会问题，避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后来，孙中山又把三大革命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①，并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了出来。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民生是欧美进化的三个阶段。“……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② 中国不仅要实行民族、民权两种主义，以建立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而且要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实行民生主义，以“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就是孙中山的救国救民方案，也是孙中山所提出的近代化纲领。这一纲领以“民”为中心，贯穿始终，充分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握住了时代的思想脉搏，努力追赶上世界的民主潮流。与康有为的君宪救国方案相比，孙中山的救国方案无疑更为超前，更为进步。

然而，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否可以同时进行，是否应该同时进行，且不说主张君宪救国的康、梁一派人物反对^③，就是同盟会内部也意见不一。同盟会中有一些人只赞成民族革命，反对民权、民生两大主义，他们实

^① “民族”、“民权”系孙中山自己概括形成，“民生”一词的形成则有多种说法。邓慕韩回忆说，“民生”一词系由他先提出，为孙中山采用；刘成禺回忆说，“民生”一词是孙中山受他的启发而提出来的。见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3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②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8页。

^③ 1905年至1906年间，改良派与革命派围绕是革命还是改良、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建立民主共和以及要不要实行土地国有三大问题展开争论。《民报》第3号曾发布号外，列举双方辩驳的纲领，计12条，内容如次：“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见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二），272～2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当然，二者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并不排斥民主共和，只是强调现阶段只能行立宪，不能行共和，其着眼点在于现阶段能做什么。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要着眼于未来，他们认为中国不改革则已，要改革就得取法乎上，因此中国不仅要实行民主共和，还要实行社会革命。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两种不同的救国方案各有缺点，又各有其合理之处。比如梁启超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果行共和，必将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割据，又说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首先应该想办法发展资本主义。民国以后的历史，恰好印证了这一点。